

從一封明人「尺牘」 看松江書家陸深對故鄉的態度

陳瑞玲*

摘要

陸深（1477-1544）是明代書法巨匠董其昌宣揚松江地區的書法傳統時，經常會援引的同鄉前輩，並以個人政治上的成就，與致仕後造福鄉里的事蹟，讓歷代松江府志將他視為不忘故土，光耀鄉里的松江子弟。但是，檢視目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陸深寫給兒子陸楫的私人書信，卻透露出他對於松江地區，不同於公開場合的複雜情緒。本文便是以陸深的家書，試圖討論他在「公」與「私」的分際中，所表露的私密情感，以及他在明代中期地方文化意識逐漸抬頭的氛圍下，如何看待自己的故鄉。

關鍵字：陸深、松江、明代書法

*臺北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一、前言

明代書法巨匠董其昌（1555-1636）在宣揚松江地區的書法傳統時，經常會援引同鄉前輩陸深（1477-1544）的書法，作為自明初沈度（1357-1434）、沈粲（1379-1453）兄弟以來中興松江書風的中流砥柱，同時也是足以與吳門書家相互抗衡的書法巨匠¹。董其昌之所以如此，除了陸深的書法繼承二沈以來「圓熟精緻」的書風，並自趙孟頫（1254-1322）及李邕（678-747）處取法而自成面目外，也因為陸深曾經在公開場合，標舉松江書風的獨特地位所致。實際上，在書法史上首先標舉松江書風的書家正是陸深。他在〈題所書後赤壁賦〉中說道：

國初書學，吾松嘗甲天下，…二沈先生，特以毫翰際遇文皇，入官禁近，屢遷為翰林學士，故吾鄉有大學士小學士之稱。…予家有二沈手筆不少，而以民則赤壁賦小楷為第一，惜乎，止得前篇。為寫後賦以具蘇文之全，非敢方駕於古人，聊以示兒曹耳²。

他是第一位將明朝初年，於書壇獨領風騷的二沈書風，給予地域性的

* 本文要特別感謝陳德馨學長在筆者撰寫過程中參與討論，並給予許多寶貴建議。

¹ 董其昌，〈論雲間書派〉，《畫禪室隨筆》，卷1（台北：廣文書局，1968），頁6。

² 陸深，〈題所書後赤壁賦〉，《儼山集》，卷8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6-7。

區隔，並強調二沈書法與松江關係的評論者。陸深之所以如此評論，固然是因為他補寫後赤壁賦於沈粲的書跡之後有感而發；同時也是想向有志書學的松江晚輩們，重新整理出故鄉過往的書學光榮，以鼓勵他們光大松江的書法地位。

在現有的資料可以看到，陸深對松江是充滿熱情的。他出身松江府上海縣，之後屢次出任封疆大吏，最後進入內閣，可以說是勳業彪炳。致仕後歸返上海故里，不但修橋鋪路，造福鄉里，而且還爲了防止倭患繼續騷擾，以夫人梅氏的名義，捐款築城，成爲上海最早的城牆³。或許是因爲他在書藝、勳業及鄉里上都卓有貢獻，所以比較起之前的其他松江書家來說，他都更加適合被董其昌引爲松江地區的代表人物，而歷代松江府志也因此不斷傳頌他的事跡，將他視爲鄉里引以爲傲的鄉賢。陸深與松江的關係，便以如此的形象深印在後世的心中，成爲不忘故土，光耀鄉里的松江子弟⁴。但是這種熱愛鄉里、光耀松江的形象，畢竟只是陸深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模樣，他對松江，尤其是故鄉上海，感情其實是相當複雜的。他過世後，兒子陸楫（1515-1552）將他生前所寫的所有文集編輯整理爲《儼山集》，付梓刊印。排除以收錄雜說爲主的〈外集〉之外，單是全集及續集便高達百餘卷，其中值得注意的便是他宦遊南北時，寫給妻兒的書信。陸深在這些私密的書信中，表露了許多他在公開場合中所沒有呈現的寶貴意見，而對故鄉

³ 唐錦，〈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儼山陸公行狀〉，《龍江集》，卷1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17-8。

⁴ 〈松江府〉《江南通志》，卷19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35。

上海的態度，尤其與他公開表現出的態度相當不同。

或許，董其昌揀選陸深作為松江地區書家的中堅，最根本的理由還是著眼在他書藝上的成就，至於陸深對故鄉上海的態度正反與否，與他在書法史上的地位無關。何況「公」與「私」之間的分際，原來便是傳統中國行之有年的社會規範，陸深無法在公開場合表達的意見，透過私人書信與兒子表露，亦屬人情之常，無可厚非。只不過，引人興味的是，陸深在書信中所表述的，對上海的負面意見，是如何產生的？他又是如何舉出實例說服其妻兒離開故里？最重要的是，身為一名松江書家，或是說一名松江著名的文人，以如此負面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故里，在明代中期地方文化意識逐漸抬頭的氛圍下，又具有什麼樣重要的意義？本文便是試圖透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陸深寫給陸楫的一封《尺牘》，進行以下的討論。

二、陸深的《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封陸深所寫的《尺牘》（圖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雖然這封尺牘的開頭沒有收信者的姓名，但是從書信中所提及的「吾兒」二字來看，這應該是寫給獨生子陸楫的家信。書信的內容如下：

得汝母書，不欲北來，亦是連次受累，慮怕。奈何！奈何！

只且早晚寬慰，不可勉強。況恩典在。冬至南郊，方有文移。往來起送，卻恐途中受暑熱，新孫且不可遠行，汝姊

病後，甚難，甚難，吾兒須打算與汝母離別，得半年中可

保無事，只汝自來亦可也。別有書。

這封書信收存在《儼山集》中，歸屬於〈京中家書〉的欄目，根據〈京中家書〉目次，以及陸深當時所處的可能地區來看，這封家書應該是寫於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至十九年（1540）之間，諸多書信中的一封，而信中所謂的「北來」，就是來北京的意思。

在風格上，稍晚的書評家王世貞（1526-1590）曾說：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遺教》意。

然不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節

尤妙，余嘗見其于研光吳綾上，書《南遷》諸詩，神采奕

奕射人⁵。

特別點出陸深受李邕、與趙孟頫的關係，的確，相較於松江地區的前輩書家沈度、沈燦等人，陸深的字結體方整用筆較圓，筆畫的完成度高，展現出更濃厚的，來自於李邕與趙孟頫一系的典雅風格。儘管內容只是平日寫給兒子，充滿私密特質的簡短信件，他卻仍一絲不苟，行氣分明，書寫時相當用心。董其昌曾評論陸深說：

陸宮詹以書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

便是學字，何得放過⁶？

這封書信當然不是應酬字，但是也可以看見他作字不苟且的特性。即使是寫給自己的兒子，也依然注意到行氣的端整與字體的優美，所顯

⁵ 王世貞，《藝苑卮言附錄三》，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5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20。

⁶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1（台北：廣文書局，1968），頁5。

現出來的書風，證實了另一位松家書家莫如忠（1508年—1588年），對他尺牘書跡的評論：

人言先生平居，雖尺簡裁答，必精鉛槧，必工結構，即于

所甚暱者，造次應之不廢也，其用力蓋勤如是⁷。

儘管態度不苟，在這封專注嚴謹的家書中，仍然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得出他書寫家書時透露的情緒。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第八行「甚難」二字的重複標寫。陸深在「甚難」二字底下連續標寫下兩次「〃」符號，表示是重寫「甚難」二字。只是他在「甚」與「難」二字偏旁，又各標寫上「〃」符號，這在書法習慣上也是重複「甚難」二字的意思。換句話說，陸深在這個詞語上，重複標寫了兩次以上，如果將這些簡化的符號轉換成文句的話，就成了「甚難、甚難、甚難」矣。之所以會將「甚難」二字重寫上三次，除了可能表示他對心中列舉的：梅夫人的意願消極；朝廷恩典的迎接事宜；女兒患病；孫兒幼弱等不能北上的理由，確實困難太高，以致只能重複的加寫「甚難」達三次以外；另一種可能的理由便是，多出來的「〃」符號根本便是誤寫了，原來只需標寫一次即可，他卻又多標寫了一次。而之所以如此，當然便是書寫時原有的思考，被其他思緒牽引所致，最後連重複標寫都不自知。但不論是感受到問題的艱鉅，還是被其他思緒所牽引，從他後來的用語，可知他書寫時的情緒，在這一時刻確實有比較清楚的變化。他一反原有的困擾，轉而以堅定的語氣，命令陸楫將最耽誤他北來的梅夫

⁷ 莫如忠，〈文裕陸公書跋〉，《寵蘭館集》，卷18（台南：莊嚴文化，1997），頁6。

人或家中其他成員暫時擱置，本人單獨北上即可。這個決定不能說不明快，陸深的腦筋一轉，便將原有的困難全部拋棄，要陸楫獨自北上。從這個決定，也可以看出陸深無可奈何的堅持，那就是如果全家不能一同前往北京時，陸楫本人一定要排除萬難立刻前來。若是如此，那麼尺牘上的「甚難」重複標寫，就可以看作是他從一籌莫展，到突然靈機一動之下的心情轉折。

三、舉家北遷的困難

這樣的心情轉折，雖然是陸深無意間所顯露出來的，但如果仔細審視這封家書的內容，或許對於陸深急切想將家人遷往北京的真正原因，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由於陸深與梅夫人的通信已經不存，所以沒有明確的資料瞭解梅夫人不願北上京城確切的理由，但是綜合《儼山集》的資料看，梅夫人不願北上，實際上有遠因與近因。所謂的遠因，應該是她絕大部分的兒女，都因為隨著陸深宦居南北，而客死他鄉所致。從陸深於弘治十五年（1502）供職南京國子監開始，就攜家帶眷前往任所。但是在南京的第二年，弘治十六年（1503）7月三女陸定桂死亡，年僅4歲；弘治十七年（1504）3月長子陸繼恩又死亡，年僅2歲；正德元年（1506）陸深赴北京應試並定居京城，次子也於那年7月夭亡，年僅8個月；同年10月次女陸京又隨著死亡，年僅3歲，連番累次兒女在官舍的夭亡，使得他在為次女陸京所寫的墓誌銘嘆道：

余客南都，癸亥以七月哭吾女四歲者；明年三月哭吾兒兩歲者；今丙寅客北都，亦以七月哭吾兒八日者；十月未盡一日，吾女京姐又死，且三歲矣，余又哭之。三年之間，四哭子女於客舍，生世果何如耶⁸？

縱使他如此悲痛，但家庭的悲劇尚未結束，兩年後的1508年，隨他宦遊南北多年的長女陸清，卻又在13歲死於北京官舍。這樣的家庭悲劇，一直都被梅夫人認為是水土不服的結果。陸深在哀悼死於南京的三女陸定桂時說道：

其母哭之慟，且數曰：不來南雍，兒或不死！雖婦人之言不通於命，要有傷予心者⁹。

梅夫人多少帶有怨懟，讀之讓人鼻酸。在長女陸清的墓誌銘中，陸深甚至記載下女兒想自北京回返上海故里治病，卻又因循拖延，最後病死北方的遺憾：

京師之醫盡之矣，……或曰是疾成於此，滯滯不愈，若南還啖河，……遂日促其母歸，未及歸，而女死。嗚呼！女果死於客耶？於是乎有遺憾矣¹⁰！

兒女接連病死官舍，既然是陸深夫妻共同親歷的悲劇，所以當梅夫人因「連次受累，慮怕」，而不願北上京城時，陸深應該是非常能夠體諒

⁸ 陸深，〈京女誌銘〉，卷76，頁3-4。

⁹ 陸深，〈不成殤女權厝誌〉，卷76，頁8。

¹⁰ 陸深，〈清女權厝誌〉，卷76，頁6。

的¹¹。但這畢竟是兒女夭亡的傷心記憶，屬於多年的過往，近年來她的身體欠佳，很可能才更是讓她不願北上京城的原因。從《儼山集》中的記載可知，梅夫人似乎一直處在病痛中，病情時好時壞，陸深的關懷溢於言表，生病時要陸楫多注意餵食湯藥；病癒後卻又說道：「汝母雖屢報好信來，終是老年要調理，加慎！加慎¹²！」總之，梅夫人的身體欠佳，確實是全家移往北京定居最大的變數。或許陸家另一位重要家族成員病死於北京官舍的記憶，亦會加深梅夫人不來的意願。那就是陸深生母，她的婆婆吳太夫人，亦是在 60 歲的高齡，往返北京、南京官舍住居，卻於 1508 年病死於返回上海故鄉旅程上的遺憾。儘管沒有確切的文字資料足以說明梅夫人為何堅決不北上與丈夫團聚，但綜觀她人生的經驗來看，在梅夫人的心中，以 60 歲高齡遠行，必定充滿風險。

至於尺牘中所謂「恩典在冬至，南郊方有文移」，基本上是引《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¹³」的典故而來。並非特指這份恩典是在「冬至日」頒下，而是一種比喻，意思是唯有等待朝廷正式的恩典頒布下來，則底下的公文以及相關流程才會正式啟動。就書信的內容看來，嫻熟官場文化的陸深已然預估到，這個官方流程應該會集中在夏天，以致於他才會說：「往來起送，卻恐途中受暑熱」了。那麼陸深所獲致的恩典是什麼呢？可以從他所上奏疏：〈乞恩比例改

¹¹ 陸深另有一子，陸桴於正德 16 年（1521）亦死於北京官舍，年僅 7 歲，見陸深，〈祭桴兒文〉，卷 83，頁 6。

¹² 陸深，〈京中家書〉，卷 98，頁 9。

¹³ 司馬遷，〈封禪書〉，《史記》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357。

給誥命追贈前母事》一瞥嘉靖 18 年（1539）以來，他所遭逢的特殊榮寵：

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恭遇皇上郊廟禮成，渙頒詔旨內一款，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敕，仍蔭一子入監讀書，欽此，欽遵續該部題准，追贈臣祖父璿、加贈臣父平，俱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祖母尤氏、臣母吳氏、臣妻梅氏皆為淑人，臣子楫行取入監。前項誥命未經關給，復於本月十五日又蒙聖恩改臣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旬日之間兩遭殊典，而宮僚高選，尤為奇逢，清銜美秩又人子思以薦之祖考而不可得者也。況臣有前母瞿氏係臣父節府夫婦未及霑榮，有恩可乞，仰惟皇上仁聖必能曲成故冒昧請之¹⁴。

這份奏疏原是為他父親的元配瞿氏夫人，再封誥命而寫。這個請求追封前母的案例並不多，自開國以來只有幾樁，但是陸深的請求於該年 9 月獲得應允。實際上陸深自嘉靖 17 年（1538）11 月，祖父筠竹公、父親竹坡公封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母尤氏、母親吳氏受封淑人開始；嘉靖 18 年（1539）正月便因立皇太子，陸楫恩蔭國子監生；同月陸深追隨世宗嘉靖皇帝南巡，改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9 月遂有成功的追封前母瞿氏夫人為淑人的事例。這兩年陸深為陸氏家族所爭取到的榮典確實豐碩。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尺牘》，既然是嘉靖 18 年底迄 19 年初（1539-40）所寫，那麼陸深在書信中為

¹⁴ 陸深，〈乞恩比例改給誥命追贈前母事〉，卷 28，頁 10-11。

陸楫所擔憂的，應該就是因為這兩年所獲致的家族榮典，而必須忍受往返起送的暑熱之苦。

至於陸深信中所提及的「新孫」，應是指陸楫新育的兒子而言。和陸深的命運相同，陸楫生養子女也非常不順利，幾乎都是在年幼時便夭折，根據陸深臨終前所言：

甲辰二月，脾胃寒泄，肌肉漸鑠，公心憂之。呼楫語之曰：

吾疾殆不可為，汝四舉子而未育，奈何¹⁵？

可知，在 1544 年陸深過世前夕，陸楫仍然沒有子嗣。在這封尺牘中所提及的新孫，應該便是陸楫這時的新生兒陸慶龍而言，這名小孩帶給北京的陸深相當的安慰，還特意為他取乳名「聞喜」，意思是聞而歡喜的意思。而且不久之後，陸楫的妻子似乎又再懷胎，所以在後來的家書中也透露，陸楫因為妻子懷孕難以成行的難處¹⁶。由此看來，陸楫因為妻子新孕，又有一子需要照顧，想要秉遵父命前往北京的意願，自然便會有更多的保留了。

而文中所提及陸楫的姊姊，應該是指陸深的第四名女兒，也是他唯一扶養長大成人的女兒。雖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知道她當時已經嫁給蘇州的太學生瞿學昭。這樁婚姻是陸深為感念尚未婚配，便消香玉殞的前妻瞿氏，向瞿氏舅家定下親上加親的姻緣¹⁷。兩人婚後，

¹⁵ 唐錦，〈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儼山陸公行狀〉，《龍江集》卷 12，頁 18。

¹⁶ 陸楫小其妻子兩歲，成婚在 17 歲。見陸深，〈與徐子容吏侍〉，卷 91，頁 4-5。

¹⁷ 陸深，〈西郊先生瞿公墓誌銘〉，卷 65，頁 6。

活躍於北京與上海之間，除了常往返北京處理陸深交辦的事務外，還擔任勸慰梅夫人及鼓勵陸楫北上的說客：「汝早晚奉母，多方寬諭、慰解，與汝姐共慇懃之，作北來計，此自有深意¹⁸。」在現存的一封信中，還可以看出她或許過於熱心促成其事，引來陸楫不滿，而由陸深寫信代為解釋的內容：

汝姐意無他，以為母親來此可以為樂，可以養病，兼風土比舊不同，以此懇情耳。無他，無他。汝意亦是孝情，亦是孝情，所謂異中之同也¹⁹。

這封尺牘言及她病後正在痊癒之中，對於陸深來說，這樣一名力促家人北上的得力助手患病，確實也是造成計畫難以成行的困難之一。

綜觀陸深在尺牘上所提及「甚難、甚難」的諸般問題，有的是客觀上的困境，譬如家中女眷的身體欠佳，或是疾病纏身，或是有孕在身，在這些狀況下迫使她們長途旅行，確實過於為難。何況朝廷頒發恩典時，所必須處理的往返迎送事宜，也是陸氏家族難以推委的榮耀。但是主觀上的困難才是關鍵，梅夫人不願北來，是擔憂北上之後，水土不服易於生病，陸深在給陸楫的書信中便說道：

但得汝子母同來京，豈不為好？汝母不欲來，只是怕病耳，可早晚勸之²⁰。

但是這種主觀上的恐懼，卻是迫使他移家北上最大的阻礙，因為陸楫在陸深仕宦他鄉時，擔負起整理上海田產家計的重擔，是陸深侍奉朝

¹⁸ 陸深，〈京中家書〉，卷 98，頁 1。

¹⁹ 陸深，〈京中家書〉，卷 100，頁 3。

²⁰ 陸深，〈京中家書〉，卷 99，頁 1。

廷時，無後顧之憂的得力助手；同時陸楫還是事母至孝的兒子，換句話說，梅夫人若不願北行，那麼陸楫離開母親，單獨北上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但是這些主客觀的困難，卻在陸深稍稍考慮之後便立刻改變，他毅然決然的要陸楫暫時離開母親妻兒，隻身前來北京，其最根本的原因，應該還是他對陸楫的期望遠過於這些難處所致。

四、陸深的期待

陸深子女多早夭，正德 16 年（1521）長陸楫一歲的陸桴過世於北京²¹，陸深的十三名子女僅剩下陸楫與另一女兒，這對陸深而言是相當沈重的打擊，所以陸楫就成為陸深希望所託。他生於武宗正德 10 年（1515），是陸深 38 歲所得的子嗣，以當時的觀念來說，陸深是老年得子。陸深對他的期望並沒有超越科舉時代，一般父執輩對子姪的傳統要求，只是在現存於《儼山集》書信裡的內容，卻透露出更加豐富真實且深刻的父子情感。

陸深非常珍視陸楫這個繼承人，除了子女過世帶來的痛苦外，最重要的是陸氏家族的興旺，是自陸深獲得功名時才開始，但是這份光榮卻不能因為子嗣斷絕而結束。最令陸深擔憂的是，除了陸楫之外，陸氏家族的其他幾房後代，也沒有可以撐持家族興旺大業的後繼者。所以他對陸楫的寄望之深，便可以想像。在他寫給陸楫的家書中，就時時透露出他的這份憂心與期待：

²¹ 陸深，〈祭桴兒文〉，卷 83，頁 6。

吾祖宗以來勤儉，敬慎孝悌，力田以起家，積而發於吾身。

黍為仕族，近見弟姪二三人，皆不如意，深慮吾家門祚衰

矣。吾兒勉當振起之²²。

對於以科考獲得高位，為家族謀得無上榮耀的陸深來說，科考當然是陸楫必須選擇的路。這個選擇在以科舉為主的傳統社會並不稀奇，特別是對陸氏家族而言，靠著陸深發跡由耕田的農人之家，轉而成為名門仕族，只有延續這個身分與地位，子侄輩科考獲得功名，才是唯一之道。何況在民風強悍的上海地區，也只有科考功名才能避免被勢家欺凌的危險。他不但告訴陸楫，對於子侄輩也常如此叮囑：「當此之日，家門已大，須防小人侵陵，惟有子弟勉勵讀書可以支撐²³。」所以，陸楫年幼起陸深就將他帶在身邊，他寫給友人的書信中時時透露，陸楫在他「對案讀書，或觀弄筆作字²⁴」的快樂。為了要讓陸楫學業增進，陸深特別選擇上海當地的文士姚子期（時望）擔任陸楫的老師²⁵。陸深認為姚子期性情恬淡，可以幫助陸楫德行的養成，不但請他擔任西席，同時也因為姚子期的兒子姚昭與陸楫年齡相近卻又稍長，所以也商請姚子期將他帶到陸家，與陸楫相互問學，既能藉由看書作文以收束心性，同時也可以因同儕間的砥礪，避免年輕人好逸惡勞虛擲光陰、沈迷於遊樂²⁶。為了酬謝姚子期的教導，陸深不時表示願意在金

²² 陸深，〈京中家書〉，卷 99，頁 11。

²³ 陸深，〈奉東隱叔父〉，卷 95，頁 2。

²⁴ 陸深，〈與小倪野正郎〉，卷 93，頁 1。

²⁵ 陸深，〈與姚時望二首〉，卷 94，頁 11-2。

²⁶ 陸深，〈山西家書〉，卷 96，頁 1。

錢上及科考的資料上提供幫忙，以協助姚昭科考順利。除了在家鄉為陸楫安排教師與伴讀的同學外，也經常將他所見以及所能抄錄的，其他士子的科考文章寄回給陸楫參考。例如他在山西任內，便將當地秀才所寫幾篇較佳的文章，寄回給陸楫：

此處亦有好秀才，不減吾江南，但十三四能作三場文字，俱通走科場者，又江南之所少也，得便寄數卷回，汝苦心可也²⁷。

當然，不好的文章也寄給陸楫作參考，以備他做比對之用²⁸。當陸楫決定前往南京，參加人生第一次的鄉試，陸深雖不認同他太早參加省級考試²⁹，但仍然像歷朝歷代陪著子女參加大考的父母般，既帶著擔心又興奮的心情，交代子女準備所有應考資料³⁰。此時，陸深在江西為官，無法親自到南京陪考，除了特別向姚子期囑咐一些細節外³¹，也寫信給南京友人請他代為照顧。陸楫的首次鄉試並不成功，榜上無名，陸深也像所有家中有考生的父母般，對於名落孫山的兒女，給予安慰：

晚來始得南京鄉試抄白名字，吾邑竟無一人上錄，豈氣運所關耶？吾兒且可因此積學未遲也³²。

這次鄉試，松江考生一名都未上，陸深在無奈之餘，只好歸之於考運

²⁷ 陸深，〈山西家書〉，卷96，頁2。

²⁸ 陸深，〈江西家書〉，卷96，頁7。

²⁹ 陸深，〈與表弟顧世安16首〉，卷95，頁7。

³⁰ 陸深，〈江西家書〉，卷96，頁5。

³¹ 陸深，〈江西家書〉，卷96，頁3。

³² 陸深，〈京中家書〉，卷97，頁2。

不佳所致。從現存的資料看，陸楫在故鄉的文名早露，且日後還參加過數場鄉試，但都不能再前進一步，他日後的功名之路並沒有發跡，但是卻留給後世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他所撰寫的〈崇奢論〉一文，更成為廿世紀學者討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契機時，必讀的重要文獻³³。經過首次鄉試失敗後，陸楫其後又經歷過幾次鄉試，在每次落榜後，陸深都不厭其煩的與陸楫檢討原因，在數封這類家書中，可以看出陸楫將文章寄給陸深批閱的記載：

寄來墨卷觀之，辭理不失，格式俱是，但氣未貫耳。將抄出細批，還得失有命，不足計較，正需更下三年縝密工夫也³⁴。

無論是居官山西、江西、四川還是兩京，縱使是官務繁忙，他仍然仔細批閱陸楫寄來的文章，當他考場失利後，也不斷給予鼓勵。換句話說，陸深非常關心陸楫科考的成果，就像他對陸楫所說的：「只望汝來秋科場一舉，吾一生事決矣³⁵」般，陸楫無法跨越鄉試一關，成為關心家門興旺的陸深，一直無法放心下來的事，即便是陸楫科考屢屢失利，他仍然對這位文名早露的兒子帶著希望。當他仕途的末期，年屆修退之際，甚至向相命術士求神問卜，以求獲得善意的回應：

³³ 現代學者討論明代社會文化變遷，多引用陸楫此文，相關的論文成果可見林麗月文，林麗月〈陸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的幾個問題〉，《新史學》，1994年5卷4期，頁131-151；林麗月，2001，〈變遷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師大歷史學報》四期，2001年12月，頁9-19。

³⁴ 陸深，〈京中家書〉，卷97，頁5。

³⁵ 陸深，〈四川家書〉，卷96，頁13。

適有星士推汝命，今年科場甚利，使我老父母早見兒成名，豈非晚福³⁶？

從陸深留存下來寄給陸楫的眾多家書中，都可以看見陸深望子成龍的心情。但是考運確實不曾再降臨到陸楫身上，陸深於嘉靖 23 年（1544）過世時，陸楫也仍然只是一名秀才而已。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這封《尺牘》，應該便是陸深望子成龍強烈慾望下所寫下的文字。他希望將陸楫從故鄉上海遷往北京，期望學習環境的改變，可以改善他科考的運氣。陸深一直認為，惟有離開松江遷往北京，陸楫才有未來。陸深的期待並非只是在書信上的說說而已，實際上他有許多積極的行動，例如他在北京已經選好住宅，準備花錢購置，安頓妻小³⁷。但這些期待與準備，幾乎都被梅夫人以身體難堪旅途勞頓，以及孫兒過小無法成行，而延擱作罷。就像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尺牘》所顯示的，陸深在失望之餘，仍然將希望寄託於陸楫身上，要他下定決心，即使離開母親半年，隻身前來北京也可。對陸深來說，陸楫才是他期望家人北來的重點，若是他能來，其他家屬即使晚些出發也無所謂。可能是陸楫的回應不夠積極，所以就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尺牘》寫過不久，陸深又再發信給陸楫，將他對舉家遷往北京居住的所有理由，一次道盡：

吾鄉近知荒歉，盜賊難免，一宜北來；吾兒在家獨學，未曾友天下士以充拓見識，二宜北來；近年北方地氣溫潤，

³⁶ 陸深，〈京中家書〉，卷 100，頁 7-8。

³⁷ 陸深，〈京中家書〉，卷 97，頁 12。

與往時不同，且多名醫良藥，汝母必喜，三宜北來；且早來謝恩，恐負遲慢之罪，兼吾老年有骨肉之樂，此等吾兒又宜熟思之³⁸。

從陸深條列的四條「宜北來」的理由中，除了他為官在外迫切想要一家團圓，及北方氣候適宜老人養病外，其他理由在別的家書中也都曾經陸陸續續的提起過，特別是陸楫在上海獨學而無友的感嘆，更是被他視為陸楫功成名就的一大絆腳石。他不只一次指出故鄉上海是個沒有文化深度的海濱小郡，他在〈江西家書〉中便說道：

念吾兒獨學於家，海濱新縣，殊少麗澤之益，欲告吾兒者，非筆墨所能盡，賴兒知向上，不昧於是非，頗足慰老懷耳³⁹。

後來在〈京中家書〉中，也不諱言對故鄉上海人才缺乏的失望：

汝所論交游事，不必有促迫氣象，海濱小邑，風俗頹靡之餘，豈能便有豪傑之才可友⁴⁰？

這些對故鄉文化程度極為貶抑性的指摘，出自陸深這位常自豪的說：「國初書學，吾松嘗甲天下」的愛鄉者之口，確實令人頗感驚愕。當然，陸深對故鄉的貶抑，並不僅是爲了激勵陸楫北來的策略性用語。事實上，上海一地也確實開始出現讓人感到「此地居，大不易」的危機。最明顯的問題，便是嘉靖年間江南沿海，倭寇作亂的加劇。從嘉靖初年開始，原來便已令朝廷相當頭疼的江南海寇騷擾現象，因嘉靖

³⁸ 陸深，〈京中家書〉，卷100，頁8。

³⁹ 陸深，〈江西家書〉，卷96，頁9。

⁴⁰ 陸深，〈京中家書〉，卷98，頁8。

十八年（1939）市舶司撤銷；太監管理的不當；日本朝貢糾紛的加劇以及東南海防的長期廢弛，而變本加厲⁴¹。松江府治下的上海縣在逐漸惡化的東南海防中，確實面臨極大的治安危機，陸深在書信中所提及的「盜賊難免」，顯然便是指這個狀況而言。

陸深對於上海縣治日漸嚴重的治安狀況充滿驚惶，他在一封寫給陸楫的家書中說道：

汝母子居海濱，風俗日下，兼近來火盜屢作，不可不深長為慮，縱吾他日得歸老江南，欲就城郭居住，知之，知之⁴²。

從陸深這封家書的語氣中，可以看見他對上海治安完全不敢信任的態度，即使是日後歸老江南，也不敢居住於此，而要搬遷入有城牆護衛的大城居住的恐懼。陸深期待住進城內以保身家安全的想法，因陸楫久久不能北上團聚，使他有了協助上海地方官民築城的計劃。但是陸深這個築城計劃，當時還只是停留在與內閣幾位宰輔的對話中，並沒有付諸實行。原因除了「不見吾鄉人有樂從趨事之意⁴³」外，便是他一直未曾放棄移往他郡，以求一勞永逸的想法。對陸深來說，首選之地當然是天子腳下的京城。在一封家書中，陸深說道：

⁴¹ 蓋杰民，〈嘉靖時期：1522-1566〉，收於牟復禮編，《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479-553；更詳實的細節可參考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幾個問題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⁴² 陸深，〈京中家書〉，卷99，頁8。

⁴³ 陸深，〈京中家書〉，卷99，頁11。

吾意欲汝攜家來京，此實為風俗薄惡，乃出避地下策耳⁴⁴。而在陸深書信中一再對家鄉風俗嚴苛的批評，例如「風俗薄惡」、「吾邑人貪利而無遠謀⁴⁵」、「聞之故鄉風俗大不如前⁴⁶」、「吾邑旁浦邊海連年，人心風俗日趨下流⁴⁷」、「吾鄉水土薄，風俗日下⁴⁸」、「吾鄉時俗，一毫不可效尤也⁴⁹」等用詞，並不只是出現在給兒子陸楫相當私秘的家書中而已，早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他寫給友人汪器之的書信中，便直接的指出留在上海地區，有如面壁：

壬申…深之欲私致一賀者，又復在此僻居海角，若面牆壁，日遠大人君子之教為懼。…令兄先生居京師，況味何似？令弟又復失意⁵⁰。

這種對故鄉文化風俗的貶抑性說辭，或許只是為了襯托北京文化豐富的客套話，但若檢視日後他這些隱身於家書中的批評，不得不承認陸深對上海故鄉的看法，確實與他在書法史上提及故鄉時，動輒驕傲的直呼「吾松」的形象相當不同。

仔細翻檢過陸深留存下來的各種文獻資料後，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陸深《尺牘》的內容，才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在陸桴過世，其他子侄都不成材，而陸楫又文名早露的狀況下，期望陸楫獲得功名

⁴⁴ 陸深，〈京中家書〉，卷 100，頁 3。

⁴⁵ 陸深，〈京中家書〉，卷 100，頁 4。

⁴⁶ 陸深，〈京中家書〉，卷 99，頁 11。

⁴⁷ 陸深，〈京中家書〉，卷 99，頁 10。

⁴⁸ 陸深，〈江西家書〉，卷 96，頁 6。

⁴⁹ 陸深，〈京中家書〉，卷 99，頁 6。

⁵⁰ 陸深，〈與汪器之〉，卷 91，頁 11。

維持家聲不墜的陸深，面對陸楫鄉試屢屢不順的結果，內心的焦慮可想見。所以故鄉上海地區缺乏文化內涵的批評，便成爲他在家書中用來勸服陸楫離開的一大原因。他的用詞嚴厲且苛刻，除了他陸陸續續提及的家族紛爭、倭寇騷擾以及豪族的惡勢力外，引發他對故鄉的負面情緒，還是考量陸楫的功名所致。他刻意將陸楫的功名不順，轉嫁給上海惡劣的文化環境，在策略上來說是一股推力；至於相對的拉力則是不斷說服陸楫北京地區的正向訊息，除了氣候宜人、文風鼎盛外，在現有的文獻中，還載有一封與陸楫討論恩蔭人選的書信，從中可以看出他在恩蔭人選的選擇，仍然以陸楫得以北上京城爲最大考量：

恩蔭一事，諸公多勸遺之小孫，石門甬川尤拳拳，此皆知愛吾兒也。吾意決與吾兒，此則本分事，於大體上亦穩當，後來顯榮吾兒自力致之。而且脫卻升散送迎之勞，閉門加工，來北京鄉試一科，此後事不可預，必聽之天可也。但需勉勵德業，以圖補報耳⁵¹。

嘉靖 18 年正月明世宗立次子朱載堉（1536-1549）爲東宮太子，所以陸深得以恩蔭一子入國子監，當時陸楫本人及不少京官、同僚都建議他恩蔭長孫，也就是陸楫新生的兒子陸慶龍，但是陸深仍然選擇恩蔭陸楫，最主要的理由是陸楫可藉此機會，將全家遷離上海，移往北京。陸深對陸楫功名的期待是如許之深，以致找出各種辦法拉引陸楫離開上海。這種作法固然可以說是一種策略，但是也不能說陸深所言不符事實。與蘇州相對峙的松江，在當時已經蔚然成爲東南富庶的大城，

⁵¹ 陸深，〈京中家書〉，卷 99，頁 1-2。

其轄下的上海縣治亦然。只是與文風鼎盛的蘇州相較，松江確實有其獨特的面貌，而這種面貌正是陸深用來說服陸楫離開故鄉的事實基礎。

五、不利讀書問學的松江士風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這封尺牘中，可以看見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深切期待，尤其是對於科考功名的勸勉，可以說是用心良苦。只是這種現象在 16 世紀的明代，與現在所理解的科學文化中並不特殊。松江士大夫如此，蘇州士大夫亦然。民生富裕，財富積累，原來便是明代中期蘇松地區的一大特徵。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的學者，大都將蘇松兩地看作是同一性質的區塊，可以從中檢視明代經濟發展的成果，以及資本主義在中國啓蒙發芽的證據。只是這種從社會經濟發展出發的角度，雖然可以如此處理蘇松地區，但是細究兩地的文化與民風，卻又有所差異。畢竟這兩個府治，除了有不同的文化與歷史，地理環境也迫使他們發展出不同的人文風貌來。蘇州自先秦以來，便是個文化古都，歷朝歷代至此活動的文人雅士，更是留下不少著名的傑作。所以名勝古蹟，特別是所謂的歷史記憶特別豐富，使得蘇州宛如一座歷史文化的寶庫，而活動其間的蘇州文人，更得以陶冶出濃厚的文化氣息。縱使在民風逐漸走向崇奢競侈的流風下，仍然保有旺盛的文化創造力。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便頗具說服力的指出，蘇州的士風比較不喜歡在京爲官，獲致功名及在朝做完一定的任期後，都會選擇返回蘇州故里，過著悠遊林下的生活。除了與友好同志結社聚遊，作

歌賦詩外，便是深自眷戀蘇州保有的高度文化氛圍所致⁵²。

相較於蘇州悠久的歷史文化，松江畢竟是新興的市鎮，宋代時僅是蘇州鄰近的小市鎮，因為元末戰亂紛起，為逃避戰禍而遷徙過來的文化士族，才成為松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從著錄中所高倡的兩位當地著名文人，曹知白（1272-1355）與楊維禎（1296-1370）為例，或是富甲一方，以農田水利見長，或是長歌豔舞，劇飲終日，風尚所及，確實呈現出有別於蘇州地區的優雅，表現出強悍務實的特質。根據明中葉逃避倭寇之亂，寓居蘇州的松江文人何良俊（1506-1573），在他所寫的《四友齋叢談》中，便根據他多年對兩地民風的觀察比較，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雖然此書成書時間略晚，但是對認識上海地區，在陸深所處時代的獨特文化氛圍，也有相當幫助。何良俊提及松江民風的特色時，特別強調受到來自蘇州文化的影響：

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

氣近也⁵³。

蘇州與松江兩地區相近，相互影響難以避免。但是何良俊這番觀察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別指出松江是文化接受者。澆薄風俗是如此，優雅文化也是。只是在松江地方縣志中，對於本地民風便有更深入的說明。在武宗正德年間修撰的《正德松江府志》，對於松江府的民風轉變，便有段記載：

⁵²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與民眾〉，《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6（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29-265。

⁵³ 何良俊，〈正俗二〉，《四友齋叢談》卷35（台北：中華書局，1959），頁323。

習俗奢靡，見於舊志，大率指宋元時，入國朝來，一變而為儉樸。…成化來漸侈靡，近歲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⁵⁴。

府志的撰修者，為宋元時期到正德年間松江府風氣的轉變，做了編年的說明。宋元時期松江地區，因為僻處中原戰火之外，所以避難定居的富商巨戶很多，他們為此帶來繁榮與奢侈的基礎。但是明朝初建，朝廷政策的推動，松江民風反而以儉約為尚，而這個風尚，到了孝宗後逐漸又恢復過去崇極奢侈的惡習，到了修撰方志時，可以說是變本加厲了。《正德松江府志》的修撰者對這樣民風轉變有所感慨，但是對於走向奢靡的基礎，百業繁盛，人民富裕的社會現象，卻是更為重視的。作為松江府治下的上海縣，地理方位雖然更加偏遠（圖二），但是這股瀰漫蘇、松地區的崇奢風尚，並沒有因為上海的地理位置而減弱，相反的，是更為加強其影響力。在孝宗弘治年修撰的《弘治上海志》，便在〈風俗〉項下對此特徵有所描述：

上海僻處海奧，風氣純樸，民多畏法恥犯，力田遠賈，罕聞巧偽，數十年來人文宣朗，名士輩出，博古慕禮，斐然成風。然頗崇華黜素，雖名家右族，亦以侈靡爭雄長，往往踰越其分，而恬然安之，其兇黠者，甘刑如飴，告訐相高，尤好崇飾其外，以聳觀視而肆然無所忌憚焉。故文賢人物之盛，雖曰倍蓰於昔，而渾厚之風衰矣⁵⁵。

⁵⁴ 顧清等修纂，〈風俗〉《正德松江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市：上海書店，1990）卷4，頁10-11。

⁵⁵ 唐錦編纂，朱曜校正，〈風俗〉《弘治上海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

《弘治上海志》裏這段對上海縣境民風的描述，雖然與松江的整體印像相似，但是更將重點置放在崇尚奢華與兇黠甘刑的強悍民風上。上海位處海濱，原來就是海灣沖積平原上發展起來的漁村。雖有廣闊的棉田可以種植；也可以透過海上貿易發展商業活動，但是卻沒有深厚的文風可以倚恃。士家巨族遷居上海後，往往購地買田，建構出一種欺壓在當地百姓頭上的莊園。莊園內的奢華生活以及雅緻的文化，基本上都是自外移植過來的，與當地原有的淳厚民風有高深的鴻溝。因此在縣志〈風俗〉項中，才會遺憾的指出，文賢人物雖較之以往興盛，但是淳厚風尚已經衰弊。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談》中對松江士風的觀察，當然也包括松江府上海縣治而言。對他來說，衰弊的士風不只是修撰縣治者的一種喟嘆而已，而是他經過長期觀察，親身體驗下所獲得的見解。他認為松江士風充滿現實功利的特質，對於文化知識的追求，遠不如功名利祿的興趣。在一項論及他觀察儀真縣士風的記載中，他將松江與儀真作了比較：

儀真一友人朱荊溪，名永年，以歲供官至知縣，有文亦能詩，聞儀真讀書後輩，皆從之講藝，有遊覽必相隨以行，故近來真揚之間人才亦彬彬可稱。吾松絕無此風，故雖科第輩出，然恐盡今之世，欲成就一箇名人，終不可得也⁵⁶。

他以江北儀真地區，有志於學的文士，如何亦步亦趨的追隨，能文工詩的知縣朱荊溪，來襯托松江士子缺乏這樣追求文化，特別是文人名

編，上海市：上海書店，1990），卷1，頁4。

⁵⁶ 何良俊，〈正俗二〉，卷35，頁321。

士涵養修習的熱忱。雖然，松江不乏科考常勝的士族，但是他們對於追求尊崇的官職，遠過於成為文化名士的興趣。以致於何良俊在觀察過儀真士子，兢兢業業追求文化知識，與反其道而行的松江士風之後，不得不慨然嘆息松江士風的頹弊。何良俊雖然遺憾松江士風不如江北儀真，但是他真正的意思，並不是指松江文風不盛，而是指松江追求士風的目標，不在追求成就文化名士，而是將讀書問學，視為追求高官厚祿的工具而已。

對於松江士大夫這種重功利的士風特色，後來何良俊以更為生動的內容給予補充，他在〈正俗〉中說道：

蓋吾松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於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聲，而日逐奔走於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莊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某人為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礙於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於面，而代之唯恐不謹⁵⁷。

何良俊對松江這種現實功利的士風描寫得相當傳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松江士子在考中進士前後的轉變。考中進士之前，所交往的是同堂學友，是談文論道之士；但是考中進士之後，這些平日交往的朋友則價值盡失，不願見面往來，關心的僅僅只是土地的買賣，經濟獲利等等事情。何良俊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他所描述對象的姓名，但是正如他對松江其他方面的觀察一般，這項記載應該是他總結松江士風後

⁵⁷ 何良俊，〈正俗一〉，卷34，頁312。

的整體印象。

由於商業發達，松江地區本來就跟蘇州等地一樣富裕，但兩相比較，松江臨海的環境更增加了海上冒險，商業活絡的特質。倘若如何良俊所言，經濟上的利益才是松江人的最終目標，那麼讀書考試也僅只是方法之一而已。這樣的士風相較於蘇州，儀真把讀書問學視為涵泳自身成爲文化名士的途徑，也難怪何良俊會很感慨的指責松江子弟：

松江士大夫子弟不甚讀書，昔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孝悌忠信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足名世矣。今世父兄非不知教，子弟非不知學，正恐多財爲累耳，則財之爲害，可勝言哉⁵⁸。

在何良俊的觀察中，這股追財逐利的風尚，自然會影響松江子侄讀書問學的意願，過多的財富竟然招致這種結果，使得寓居蘇州多年，深愛蘇州文化氛圍的他，也難掩對松江故里士風頹弊的慨歎。但如果松江士子不讀書，不只是士家巨族的特有現象，而是這個崇奢競侈的松江府，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化的話，那麼陸深在書信中對故鄉的苛評，並藉此勸陸楫遷移遠離，便應該被視爲是深知松江士風特色者的肺腑之言了。根據現有的資料，陸楫約莫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尺牘》接到後不久，便克服萬難，舉家動身遷往北京。在日後的其他書信中仍然可以看見，陸深交代陸楫安排船隻及詢問行程的內容⁵⁹。只是這次移家北上的時日並沒有太久，因爲一年後的嘉靖 20 年（1541）5 月，陸

⁵⁸ 何良俊，〈正俗一〉，卷 34，頁 313。

⁵⁹ 陸深，〈京中家書〉，卷 100，頁 9-10。

深便因為致仕，舉家又再次返回上海定居，直到嘉靖 23 年（1544）他在上海寓所過世為止。

六、結論

陸深之所以會在書信中，透露出如此強烈的焦慮感，如果將之放在明代中葉松江地區特有的文化背景來看，便可以瞭解他的心境。松江士風只追求功利性的功名，士家大族的子弟也不愛讀書，看在有心振奮家業的陸深眼中，確實是令人失望，再加上家族紛爭、海盜入侵作亂，更加強他遠離故鄉遷往北京的意願。只是形勢使然，他的遷徙計畫因為致仕而中斷，歸返回上海故里的陸深，便致力於提升松江藝文的大業，並在撰述、版刻、書法上都有所建樹。陸深之所以如此，除了回返上海後重新燃起的鄉土之愛，便是感受到來自蘇州的文化威脅所致。特別是在朝為官的陸深，便可在任內感受到來自蘇州地區政治力量的擠壓，這股強勁的政治勢力，伴隨著蘇州的富裕經濟以及強勢的文化自信⁶⁰，便特別引起陸深強烈的關切。

陸深對蘇州勢力可以感受的方面很多，最具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刻的，應該便是國朝書風自松江到蘇州的轉移。而這也是董其昌、王世貞等人之所以會在書法史上，一再引述他的書藝成就及相關評論的原因。國朝初年沈度、沈粲兄弟書風擅場的時代，他們的書藝成就

⁶⁰ 石守謙，〈「兩餘春樹」與明代中期蘇州之送別圖〉《風格與世變》（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230-260。

可以被廣泛的視為代表帝國新象的全國書風，是當時有心藉書藝，邁入政壇者所競相模仿的書風。但是到了陸深所處時代，書壇盟主已被蘇州人所奪，而蘇州人卻依恃相互援引，彼此唱合的方式⁶¹，將一地方書風推廣成全國的書風，完全取代由二沈開創且為松江人長期保有的書壇地位。陸深對於蘇州書風似乎並不欣賞，而對於已經成為蘇州書壇領袖，甚至已為全國知名文士的文徵明更顯蔑視⁶²。陸深的這種態度，或許可以視之為對蘇州一地書法勢力高漲下的一種情緒反彈。

面對蘇州人藉著相互題跋，將祝允明、王寵、文徵明等仿宋風格的書風，引薦到京城，並因此擴大其影響力，使他們成為領導全國的書法新秀。陸深也積極推薦松江書家進入朝廷服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張電。根據清代楊逸編寫的《海上墨林》對張電的記載：

張電字文光，松江華亭人。書宗李完庵，以布衣從陸深。

師，夏相國言見而器之，令書御製集禮序。世宗嘉賞，遂由儒士入史館供事，時建皇史宬，命電題額，詔賜金幣，授鴻臚寺序班，遷中書舍人，累官至禮部左侍郎。朝廟典冊，必使電書，凡行幸游晏，未嘗不從，賜予優渥，自布衣躋卿貳，始終恭敬善藏，故受知眷最深⁶³。

⁶¹ 「吾松江與蘇州連壤，其人才亦不大相遠，但蘇州士風，大率前輩喜汲引後進，而後輩亦皆推重先達，有一善，則褒崇贊述無不備至，故其文獻足徵。吾松則絕無此風，前賢美事皆煙沒不傳」，見何良俊，〈史十二〉，《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6，頁134。關於陸深在京不與人盤旋宴會，與蘇州人不同的說法，見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1，頁5。

⁶² 陸深，〈跋東海先生草書卷二首〉，卷87，頁5-6。

⁶³ 楊逸編，《海上墨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卷1，頁4。

張電以布衣身分，藉書藝竟然獲致如此巨大的榮勳，除了他個人恭謹自持的為官之道外，引薦他進入朝廷的陸深，更是功不可沒。然而最為書法史稱道的是，他將二沈兄弟的書藝成就，予以重新整理表彰，並將他們建構成松江有志書法者的文化英雄。這段重要的記載，是題寫在〈題所書後赤壁賦〉中。這件書跡原來是陸深為沈粲書小楷「前赤壁賦」後，補寫「後赤壁賦」而題寫的註記⁶⁴。文中除了指出松江書風淵源，二沈兄弟以書藝博得翰林學士的光榮之外，並對沈度書風轉變前後的特色、二沈相互謙讓書體，不欲兄弟爭能的情誼，引為松江子弟效法的楷模，雖然無法確知題寫的時間，但從文字的內容來看，應該是致仕後，回返故鄉上海而作。陸深於嘉靖 20 年（1541）5 月榮退，回返上海故鄉後，便修橋鋪路，捐款築城，繼續其松江書藝的推廣，像當時著名的上海書家浦澤，便是他的學生⁶⁵。但更為重要的是，因為他顯赫的官聲，所以引他為傲的鄉里，自然便會將其書跡刊刻於公共建築中，楊逸便說：上海「邑中石刻，多文裕手筆⁶⁶」。換句話說，陸深的書藝透過學生的學習以及書跡的刊佈，便成為松江士大夫熟悉，並引為足與吳門書家相庭抗禮的書法巨匠。

（本文責任校對：歐陽馥）

⁶⁴ 陸深，〈題所書後赤壁賦〉，卷 86，頁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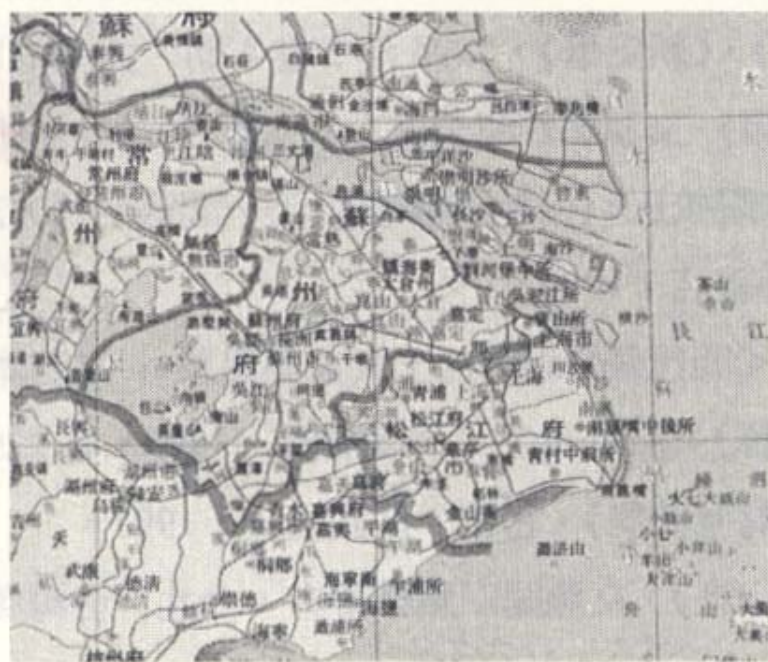
⁶⁵ 楊逸編，《海上墨林》卷 1（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頁 4。

⁶⁶ 同前註。

圖一 陸深《尺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元明時期蘇州與松江地區歷史地圖，轉載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市：中國地圖出版社，2004，第七冊。



參考書目

- 1、王世貞，《藝苑卮言附錄三》，見《弇州山人四部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2、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3、石守謙，〈「雨餘春樹」與明代中期蘇州之送別圖〉，《風格與世變》，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230-260。
- 4、何良俊，《四友齋叢談》，台北：中華書局，1959。
- 5、林麗月，2001，〈變遷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師大歷史學報》四期，2001年12月，頁 9-19。
- 6、林麗月〈陸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的幾個問題〉，《新史學》，1994年5卷4期，頁 131-151。
- 7、唐錦，《龍江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8、唐錦編纂，朱曜校正，《弘治上海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市：上海書店，1990。
- 9、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與民眾〉，《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6，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229-265。
- 10、莫如忠，《寵蘭館集》，台南：莊嚴文化，1997。
- 11、陸深，《儼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12、黃之雋等編纂，趙弘恩等監修，《江南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13、楊逸編，《海上墨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 14、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台北：廣文書局，1968。
- 15、蓋杰民，〈嘉靖時期：1522-1566〉，收於牟復禮編，《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16、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幾個問題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 17、顧清等修纂，《正德松江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市：上海書店，1990。

Modifying Lu Shen's Attitude Toward Hometown: According to Lu's "Personal Letter", collection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Ju-ling Chen*

Abstract

Contributing hometown after acquiring high-rank position in the Ming Empire, Lu Shen (1477-1544), bearing praise and proud of his hometown, was considered a grateful native and successful model of political career in Sung-chiang. When mentioned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chievement in Sung-chiang area, Chi-chang Tung, a famous contemporary calligraphist also born there, often contributed his success to Lu's inspiration and praised Lu's superior moral with respect. Meanwhile, according to Lu's letter to his son, Chi Lu, Lu was no longer a complete devotee and inconsistent with what he formally considered. This paper therefore intends to reveal and compare Lu's image in private (to his families) and in public (remarked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local history, Sung-chiang-fuchih). Through a closer look, more real attitude of Lu will be presented.

Key words: Lu Shen Sung-chiang, Calligraphy of the Ming Dynasty

*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